

贵州文化老人
丛书

张祥光 著



DUSHIJIGAO
读史集稿

岁月易逝，人生难满百。人到晚年，遇事联想，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常云“淡泊名利”，更有体会。学海无涯，本人才疏学浅，囿于见闻，各个时期所写的文章，疏误定有，敬请指出。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读史集稿

张祥光 著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云南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史集稿 / 张祥光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5

(贵州文化老人丛书 . 第 2 辑)

ISBN 978-7-222-10835-6

I . ①读… II . ①张… III . ①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 ① K0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9703 号

责任编辑 : 赵丁丁

特约编辑 : 唐 山

责任印制 : 洪中丽

书 名	读史集稿
丛 书 名	《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第二辑
作 者	张祥光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印 刷	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835-6
定 价	125.00 元 (共两册)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顾久
副主任 王德玉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 杨庆武
委员 翁家烈 张新民 张润生
李立朴 王任索

编辑部

主任 王尧礼 副主任 陈丹阳
编辑 王尧礼 陈丹阳
庞思纯 罗珍琼 胡海琴
郎启飞 俞菲 唐山

总序

顾 久

《贵州文化老人丛书》就要出版了，我有责任来交代一下缘起。“尊贤尚德，敬老崇文”，是文史馆的宗旨，整理出版馆员、特聘研究员著作，是这一宗旨的体现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馆里陆续资助出版了十来种馆员、特聘研究员的文集，因为经费支绌，只能内部印行，影响受到很大限制。庚寅之夏，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赵克志同志来馆视察，馆中提出了一个编辑出版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的构想，赵克志同志当场批准，并指示随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办理经费划拨事项。困扰我们的根本问题一朝纾解，文史馆随即组成了编委会，对书稿进行遴选，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负责具体编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贵州文化老人”一语，起于刘学洙先生对陈福桐先生的称谓，实则当得起这个称号的人不止陈先生一个，所有年高德劭、学养深厚的先生们皆是。如此则外延有所扩大，非我馆馆员、特聘研究员也在其中。所以丛书的作者以馆员、特聘研究员为主，兼顾其他。丛书内容也很宽阔，涉及了文史哲及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形式更是多种多样，诗文、论著、书画皆有，看似庞杂，却有一个主旋律——贵州。

朱子解释“文献”一词说：“文，典籍也；献，贤也。”贤，就是熟悉典章制度、见闻广博、年高德劭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

化老人。整理出版他们的著作，也就是保存文献，文史馆的责任就是存史资政，历史是根据所存文献编写的书。这部丛书的重要性，也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编辑诸君为这部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谢谢大家。

最后，还得再次感谢赵克志同志对我省文化事业的关怀，没有他，这部丛书至少现在还出不来。

二零一三年十月

序

我与祥光同志相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大）历史系共事时，后来我调其他单位，“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因学术或工作关系复又有所接触。数十年来，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朴实、忠厚、认真、谨严。在其长期从事教学、任系主任、学报主编如是，从事学术研究亦如是，实可谓“文如其人”。

祥光读研时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其间所撰与史学名家唐长孺等先生商讨性的文章——《关于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衰亡问题》被刊于《历史教学》。后又撰有关该时期的论文七篇，其中《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一文，一九八三年中国社科院《史学情报》转载了其重要内容。《论两晋门阀制度》一文，对士族的诸多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在承担繁重教学或编务之余，因参加编写《贵州通史》而转向对贵州史的研究，成果显著，发表许多相关论文。在《诸葛亮与贵州》一文中，关于诸葛亮本人是否到过贵州这两个鲜为史家关注且又难于回答的问题，却能敏锐提出并作出准确、令人信服的诠释和论证。历时二十二年烽火遍及全黔的咸同时期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贵州近代史上波澜壮阔、意义深广的一次反帝反封大搏斗。《咸同贵州军事史》是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相关纪述与文献采编。该书作者凌惕安逝世于一九五〇年，然其生年与籍贯的最后确认者则是祥光同志。在学术研究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句题的研究有所进步，就应肯定。

本书是以业已刊发的多单篇文章汇合编就的文集。就学科而言，以史学为主，兼及其它；就时间而论，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

就空间来说，以贵州为主，兼及全国。时限长、区域广，涉及之人、事多。立论精当，史料翔实。

祥光同志在长期担负高教重任的同时，仍有著述问世，实属不易！现将原散载难觅的论文总辑成册，更有利于学界的交流、发展。

《读史集稿》有如一束史学之花，有异彩，有奇香，给人启迪，令人深思。《说苑》曰“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掩卷之后，深以为然。

翁家烈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目 录

- 001 总序 顾 久
- 003 序 翁家烈

- 001 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
- 008 谈葛亮与贵州
- 011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 023 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
- 033 关于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衰亡问题
——与唐长孺、韩国磐二先生商榷
- 039 南朝政权更迭频繁的原因
- 048 论北周武帝
- 058 汉晋时期贵州主要民族之族系及其分布
- 066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各族的变迁
- 075 艰难的开发
——汉晋至隋唐时期贵州社会经济开发概述
- 082 论李百药
- 093 南诏侵黔与杨氏据播
- 101 播州建置沿革与杨氏始末

- 110 明代“开中”在黔实施述评
- 118 万历三大征战述略
- 126 贵州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 132 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144 顾祖禹论贵州战略地位
——读《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
- 147 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
- 150 读《播雅》诗集叙题、按语劄记
- 155 贵州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概述
——兼论其阶段划分
- 174 简论丁宝桢抗御外患的思想
- 182 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
——读《曾国藩全集》日记、书信中与黎庶昌有关的内容后
- 190 义和团在京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
- 204 敬仰陶渊明 不学陶潜隐
——读李端棻《茲园诗存》
- 211 朱启钤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
- 220 早逝的英才——谢六逸
- 223 凌惕安与《咸同贵州军事史》
- 229 略评张道藩
- 232 六十七万“黔军”不解甲
——抗日战场上的“贵州草鞋兵”
- 239 二·四惨案：一九三九年贵阳之恸
- 243 《诸体文存》序
- 246 《中国文献学综说》序
- 248 略谈史料的搜集与引用

- 251 后记

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

《史记》所载夜郎史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贵州学者从多方面撰写了不少论文，然还未见有文章就《史记》有关夜郎史料按年代进行梳理。本文就《史记》中涉及夜郎之史料，按年代梳理，以窥见司马迁写夜郎方国之史迹。

在《史记》以前，我国古代典籍还未有夜郎历史的记载。夜郎得以见于世，首载于《史记》。《史记》记述了自上古至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它除了有通史的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写“当今”、写“当代”、写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较为详细。有学者统计，《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主要或重点写当今历史的就有六十九篇，《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是其中一篇。

为了说明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这里先就司马迁的生平作一简要介绍。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世家。他的生年，学者至今未有定论。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卒三岁（指其父司马谈卒）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对于这段话，由于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各有注释，产生了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和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两种相差十年的意见。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观堂林集·司马迁行年考》中主中元五年说，即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一九四四年李长之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一文中，主建元六年说，一九五五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驳王国维中元五年说，亦主张建元六年说，本文采用李长之、郭沫若先生的意见。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二十岁而漫游各地，大约在二十二岁时入仕，为郎中。郎中是汉朝一个很低的官职，其秩仅“比三百石”，具体职务为“掌

守门户，出充车骑”，是皇帝的近侍，官阶虽低，却使人羡慕。二十四岁，他侍从武帝到西北扶风、平凉、空峒。二十五岁，又奉使巴、蜀、滇，这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收集了不少材料。二十六岁随武帝泰山封禅。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任太史令。这年司马迁开始着手写《史记》。正当司马迁专心著作时，发生了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件。司马迁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武帝责斥司马迁有意为李陵辩护，对司马迁处以“腐刑”。司马迁被囚了四年，于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出狱后又做了中书令。此后又以中书令的身份，先后两次侍从武帝巡幸各地。司马迁卒于何年，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无记载，历代学者多方考证，至今无定论。

司马迁入仕以前漫游各地，出仕以后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多次侍从武帝巡幸。他周览名川大山，搜访古迹遗址，又“紿史记石室金匱之书”，查阅国家档案史料，写出了千古绝唱《史记》。他的一生与汉武帝统治相始终，因此对西汉王朝、对汉武帝比常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对这段历史也写得具体深刻。唐朝刘知几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载而已。”（《史通·杂说》）司马迁写夜郎，亦是汉武帝时期最详。

《史记》所载夜郎事，除主要在《西南夷列传》，还散见于《南越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虽主要记述夜郎、滇部落史实，夜郎又详于滇，然而在该传中，司马迁叙述夜郎的历史仅交待了两个准确年代，一个是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一个是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而夜郎诸多大事发生年代及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则没有年代记载。本文将《史记》有关篇章中记载夜郎西汉时期的史料作一汇集，尽可能梳理出事件发生的年代。本文除《史记》外，其他古籍如《汉书》、《华阳国志》等所载夜郎史料概不引用。

下面就《史记》中有关西汉时期的夜郎史料，按年代先后录述，可看出司马迁写了一篇夜郎当代史。

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

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史记·西南夷列传》）

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打听到一些夜郎情况，建议联络夜郎以击南越，这样就有唐蒙出使夜郎之行。武帝“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出使夜郎及从巴、蜀修通往牂牁江的道路，均没有时间记载。方国瑜先生认为“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唐蒙使至南越，闻有牂牁江，道可至夜郎，在建元六年以后。《西南夷列传》又载，唐蒙还报，乃发巴蜀兵治牂牁江道，应在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故疑唐蒙至夜郎为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或二年之事。”（《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从巴蜀修往夜郎的道路很艰苦，“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史记·西南夷列传》）于是司马相如、公孙弘前往西南夷视察，安抚头人，并委任司马相如经营西夷。此时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〇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派唐蒙开夜郎道，在遭到人民反对时，又派司马相如前往解释“非上意”，《史记》深刻地揭露了汉武帝的两面手法。朝廷还颁发檄文进一步解释“非上意”：“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

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回到长安向武帝汇报西南夷情况，武帝决心放弃经营南夷，而专致効力于西夷。“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为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奉命经营西夷成功回到长安后，他回想在蜀郡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为此，“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文章又提到唐蒙开夜郎道之事：“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除司马相如外，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〇年），武帝还派公孙弘巡视西南夷。

公孙弘前往西南夷视察的时间，《史记·西南夷列传》无记载，仅说：“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死者甚众……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而《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则明确记载了派公孙弘视察西南夷的时间：“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〇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

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公孙弘视察西南夷后，建议中央朝廷放弃经营西南夷，但武帝未听他的建议。而且在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南夷始置邮亭”。（《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又过了四年，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权力比以前更大了，他旧事重提，再一次上奏武帝放弃经营西南夷。“元朔三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滄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滄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但此事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却稍有不同，是说武帝止罢西夷，而南夷并未放弃，而且未记载此事的年代。该传载：“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这里说的是武帝撤消了司马相如在西夷所置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设置两县一都尉，让犍为郡自己保全。

当时反对经营西南夷的不止公孙弘一人，与公孙弘同时的学者严安，就向武帝上书，也主张不要经营西南夷：“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濱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武帝看了严安的上书，认为他是个人才，便任命他为郎中，侍从左右。

事隔五年以后的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张骞从大夏归来，向汉武帝汇报他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张骞分析可以从西南夷地区找到去身毒的道路。武帝为寻找去身毒的道路，派人前往夜郎、滇等地区，又有重新全盘经营西南夷的打算。《史记·大宛列传》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张骞从大夏回来建议从西南找到去身毒道路这件事，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除了简要重复《大宛列传》中一些史实外，还具体补充了武帝派出人员的姓名及滇、夜郎的情况，并由此引出后人所谓“夜郎自大”的典故。“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

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从元狩元年武帝派人到夜郎、滇后，又隔十年，即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春，南越吕嘉反汉。西汉王朝于是年秋天决定征调包括夜郎兵在内的四路大军攻南越。当时武帝攻打南越的计划是：“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史记·南越列传》）然而到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冬，“戈船、下厉将军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史记·南越列传》）

当驰义侯征调南夷兵将攻打南越时，在夜郎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反抗。“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史记·西南夷列传》）从前“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夜郎倚靠南越，现在南越被平定，头兰被灭，夜郎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在夜郎地区设郡的条件成熟。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西南夷地区，与牂牁郡同时设置的还有汶山、越嶲等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驩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驩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同时，“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

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牂牁、沈黎、汶山郡。”

将南夷部分地区置牂牁郡之年，夜郎侯入朝，被封为夜郎王，赐以王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史记·西南夷列传》）受封王的夜郎侯姓名未见记载，假若是唐蒙出使夜郎时见到的多同，到此时事隔约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时间也不算太长，那么多同在世亦是有可能的。

汇集《史记》中有关夜郎资料，可看出司马迁写了一段夜郎当代史。其时间从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唐蒙到南越，听到夜郎的一些情况至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设牂牁郡即夜郎侯入朝止，前后25年。这段夜郎社会历史的发展时期，正是司马迁从诞生到成长至入仕的时期，对司马迁来说，就是当代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

（原载《夜郎重释》论文集，作家出版社，二〇〇四年）